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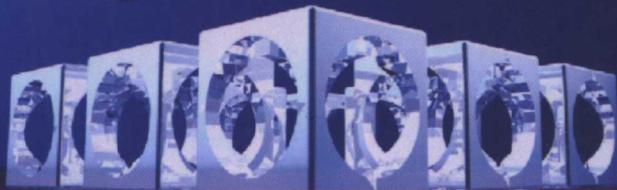


2005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

刘灿 毛洪涛 ◎主编

GAODENG CAIJING JIAOYU YANJIU
LIU CAN MAO HONGTAO ZHUBIAN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2005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

刘灿 毛洪涛 ◎主编

GAODENG CAIJING JIAOYU YANJIU
LIU CAN MAO HONGTAO ZHUBI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05高等财经教育研究/刘灿,毛洪涛主编.一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1088-458-1

I.2... II.①刘...②毛... III. 财政管理—中国—高等教育—教学研究—文集 IV.F8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5552 号

2005 高等财经教育研究

刘灿 毛洪涛 主编

责任印制:杨斌

责任编辑:李霞湘

封面设计:时单

出版发行: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
网 址:	http://www.xcpress.net
电子邮件:	xcpres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74
电 话:	028-87353785 87352368
印 刷:	四川机投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210mm×285mm
印 张:	12
字 数:	34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88-458-1/F·397
定 价:	23.00 元

1.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营销部调换。
2.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目 录

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刘 灿 (3)
优化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课程体系探析.....	毛洪涛 尹音频 (11)
深化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提高大学英语教学质量.....	邓 海 周可欣 (15)
财经院校“经济运行仿真实验系统”建设方略.....	何加明 (20)
经济、管理人才数学基础知识结构研究.....	孙疆明 刘明杰 (23)
硕士研究生教育学制改革与质量观重构	
——兼论我校学制缩短后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构建.....	张桥云 姜玉梅 赵 磊 (28)
“以人为本”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思考	王旭涛 (32)
信息素质化教育的探讨.....	陈戈止 (36)
高等财经远程教育发展方向与课程设置研究.....	林雪佳 陈 鹏 (43)
本科生导师制：高校育人的新途径.....	张 斌 帅建林 (48)
浅析二级管理模式下教务处工作职能转变.....	罗 静 (51)
与文化相和谐之教育观初探.....	邢 敏 (54)

学科专业建设

保险学院“顶岗实习”制度实施及其完善的思考.....	兰 虹 王 凯 (61)
对工商管理教育的思考	
——基于管理教育价值链研究的分析.....	张宁俊 (65)
从司法考试看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	章 群 (70)
统计学专业基础课程设计的再思考.....	王青华 (76)
国家司法考试背景下的复合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	朱悦蘅 (79)
关于财政学教学及学科建设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武振荣 (82)
关于在市场营销教学中开展国际市场开拓报告编写的探索.....	陈丽丽 (88)
论金融工程学的工程学特色.....	潘席龙 (92)

高等财经院校“寿险精算学”教学改革探讨	张运刚	(99)
就业需求导向与学科专业建设浅析	李南成	(103)
实践性教学是审计学专业教育的核心	黎仁华	(106)
司法考试背景下法学本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杨春禧	(109)

教学方法与手段

应用现代网络教育改造传统函授教育	庞 品	(115)
论本科教育实施双语教学的目的、条件和教学环节	辛强国	(119)
浅谈网络课程的交互式设计策略	郭黎明 张艳珍	(123)
公共英语教学与专门用途英语教学接轨 提高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	韩少杰	(126)
拉近远程网络学习的距离	陈学华 贾 润	(131)
自主学习模式下有效提高学生英语口语交际能力的教学策略	周可欣 盛 敏 韩少杰	(135)
财经类专业课程双语教学实践探析	吴 凡	(141)
对金融双语教学定位及发展战略的探讨	王 擎	(146)

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工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中的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	侯德芳	(153)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 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	刘为民	(157)
如何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曾 荻	(160)
积极开展本科生科技实践活动 着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毛中明	(164)
高校心理助贫工作的思考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对贫困生的精神关怀	艾 鸿 黄媛媛	(167)
财经类学生职业能力倾向测评体系构建初探 ——职业能力测评问卷的编制	赵勇君 郭铁成	(171)
成都地区大学生人际关系困扰模型探析	冯卫东 向 静	(176)
我校大学生违纪分析及对策	肖 宇	(181)
传媒素养教育：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屈小燕	(185)

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发展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刘 灿

2005年6月4日至7月3日，我参加教育部与国家外专局举办的“高校领导海外培训班”赴澳大利亚培训学习了30天。在澳期间，我们来自国内22所重点大学的校长们一共访问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科技大学、纽卡素大学、卧龙岗大学、麦考里大学、北悉尼TAFE学院、昆士兰大学、詹姆斯库克大学、南十字星大学、迪肯大学、斯运伯恩科技大学等12所大学和澳大利亚校长委员会、澳大利亚大学质量监控局2家机构，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近年来他们积极参与世界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情况有了比较充分的了解，对澳大利亚各大学在学校发展战略、大学领导的作用和功能、教学质量的保障体系、学校内部的管理等方面的经验有了一些具体的认识体会，我本人还承担了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专题研究。我认为，澳大利亚的经验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的发展改革、对于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有多方面的借鉴意义与启示。

一、对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 发展经验的认识和体会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世界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迅速发展，进入了普及化阶段。早在1995年，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就已经超过了50%，达到71.1%，位居世界第三位。

2004年，澳大利亚的大学生达约950 000人，其中海外学生约22 000人。为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大学的竞争力，澳大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对大学进行了大规模的合并重组，在90年代中期开始对高等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1. 指导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性、质量、公平、多样化和国际化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机构在20世纪80年代经过合并重组后，现有38所公立大学、1所私立大学和少量的其他教育机构。在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科技和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意识到高等教育已成为影响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面临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高等教育的竞争，政府提出了国家在高等教育领域未来发展的两个方面的目标：一是一些大学要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方向前进，进入世界的前50名；二是高等教育机构也要完成各种各样的为社会服务的使命，如研究型大学要在国家知识和科技创新中起到重要作用。

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着手一系列的改革，而整个改革框架设想的基本原则是：保证高等教育发展的可持续性，保障和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实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推进高等教育的国际化。

2. 政府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澳大利亚政府在高等教育中担负重大责任，

同时也是这一场改革的推动者。政府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一是出台了《2003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对教育资助制度进行了改革；二是构建了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三是为大学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03年12月，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2003年高等教育支持法案》，针对高等院校提出了联邦拨款计划、其他拨款和联邦奖学金三种拨款方式。这个法案将以前所有学科领域资助相同额度的生均经费改为根据学科领域确定不同的生均经费资助额度，这样来激励各个学校追求自身的独特使命，实现高等教育办学的特色化和多样化。这个法案还通过其他拨款来支持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重要领域，如支持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和学习，促进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和开放性。该法案从2005年开始全面取代《1988年高等教育拨款法案》^①，个别方面的改革从2004年实施。

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调整时期，政府及高等院校及时认识到了质量的问题，并把质量看成是高等教育提供者及宏观管理者（也是主要的办学经费提供者）的一种社会责任。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经过几次调整改革，在2000年，澳大利亚成立了由联邦政府、州和区政府、澳大利亚质量保证署、澳大利亚学历资格评定框架和各大学构成的一体化的质量保障体系，其间政府的推动和立法保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在10年前，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规模尤其是海外学生的规模并不大，而目前却有了非常快速的发展，1990年只有2万人，2004年已达到22万人，已成为在美国、英国之后的第三大高等教育出口国。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除了经济驱动外，还与其抓住机遇、主动参与世界高等教育市场竞争不无关系。政府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政策支持和强大的市场推广、放宽对海外学生发放签证和移民政策以及对海外学生提供奖学金资助等。

3. 大学的使命和学术责任：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动力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其动力还是来自这一领域的主体即大学。在我们的访问学习

中，我深深感到各个大学都有改革发展的强烈意识，特别是大学的领导者。如悉尼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ydney）主管学术和国际事务的副校长 Professor John 跟我们谈到，作为一所引领澳大利亚教学科研的大学，其责任就是要主动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参与竞争，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强调办学的国际化标准，为社会提供一流的教育和研究成果。这是他们大学存在的价值。这位校长说，他们的质量标准是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比，其目标是澳洲第1，亚洲前10，世界前40。在我们访问昆士兰大学（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新南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等大学时，在关于学校发展远景这个话题时，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使命感，并通过学校的战略发展规划来确立和保证实现目标的路径及策略。

澳大利亚各大学在办学中都十分重视追求自身特色，发挥优势。称为重点大学的“八大”（group of eight）都是研究型大学，他们承担了澳大利亚大学60%的研究项目及70%以上的国家研究资助项目，参与了80%的政府合作研究中心的研究并吸引了50%的合作研究资金，他们的目标是通过一流的研究和研究生培养来提升国家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而其他学校也能根据自身的特色和优势找到自己的位置。例如卧龙岗大学通过与工业界加强联系，推动学校科研成果的转化。在其服务对象上，他们的定位首先是服务于所在社区，随着学校的发展，着力服务于国家，然后服务于国际（即在全球知识创新中起作用）。地处悉尼北部的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创办于1964年，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大学，但凭着在教学和科研领域大胆革新的精神，近年来发展很快。他们一方面利用紧靠悉尼高科技园区的优势，大力发展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如环境与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设立了多个研究中心和3家风险投资公司（激光、基因、半

^① 《1988年高等教育拨款法案》主要是引入了著名的“高等教育成本分担计划”和“使用者付费”原则，提出了高等教育经费来源的多样化，相应确立了“以收入为条件”的学生贷款制度。在大学教育经费拨款方式上，基本上是“一刀切”的分配模式。该法案除进行了几次小的调整外，一直沿用到2004年。

导体)，另一方面大力发展国际化教育，以灵活的教育体制吸引世界各国的优秀学生来此求学。而我们访问的纽卡素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詹姆斯库克大学 (James Cook University)、南十字星大学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等，他们都是“老八所”之外的一般大学，都定位于区域性服务，但各自都有特色学科、课程，如詹姆斯库克大学地处昆士兰州北部热带地区，他们在热带海洋及环境学、海洋生物学等学科上就很有优势并引领着澳洲的研究。

澳大利亚大学是在州政府立法下独立办学的，他们在办学上有很多自主权，但他们也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一般标准，承担学术责任。《国家高等教育审批程序草案》明确规定了澳大利亚“大学”的特征，即：要有法律授权；要致力于高级知识的研究与传播；要推进一种由研究和教学基础知识扩展到新知识和原创成果的创造的学术文化；教师、研究者、课程设计者和评估者要对学术自由和知识体系的进步有责任感；要有足够的财政保障；要有规范和程序规则的内部管理及质量保障体系等等。在我们访问的 12 所大学中，不论是大学校长还是其他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工作体现出大学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责任，并从中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质量意识和服务意识。例如悉尼大学作为一所研究型大学，仍然把提供高质量的教学作为自身的重要责任。他们近年来改革了课程设置，十分强调课程设置和学生的知识结构要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十分强调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方式，强调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社会责任感、公正判断能力，而学校按大学科设置的院、系结构，学生在各专业课程中无障碍的选择，各种文化背景的同学之间无障碍的思想交流，也为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悉尼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冯教授说，在社会创新和知识转换的时代，最大的转换是学生，学生今后要成为引领知识创新的人，因此，悉尼大学的目标就是要为社会培养最好的学生。

在澳大利亚访问学习期间，我们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国际化”，澳大利亚各大学通过国

际化策略，使他们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市场的有力竞争者，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收入。在我们访问的大学中，国际化的程度以及所采取的策略有不同，但一般都包含：学生及教师的多元文化交流；学生有国际学习的经历；课程设置（课程标准）的国际化；学生来源的国际化。在各个大学的战略发展规划中，都有如何推进国际化的内容，各个学校也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及国际学生的支持服务机构。国际化已成为近年来澳大利亚大学发展改革的一个主要动力并且各大学从中受益。这一点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总的说来，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上并不是一个最强的国家，他们许多大学的历史只有二三十年时间，但他们的快速发展和调整改革时间及所遇到的国际环境，却与我国比较一致。澳大利亚的许多经验和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是，我国大学的历史、体制以及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都与之不同，不能简单照搬澳大利亚的一些做法。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世纪末，我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高等教育体制及内部管理的许多方面我们已进行了改革，已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在一些做法上我们也并不落后。当前，我们各个大学都应该思考如何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和世界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流，适应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趋势，办让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我认为，澳大利亚在政府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各大学在战略规划、发挥优势办特色、大学内部治理和质量控制以及国际化等方面的一些理念和具体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二、专题研究：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由联邦政府、州和地方政府、澳大利亚质量保证署、澳大利亚学历资格评定框架、大学五个部门组成，从政府、社会和大学三个层面上运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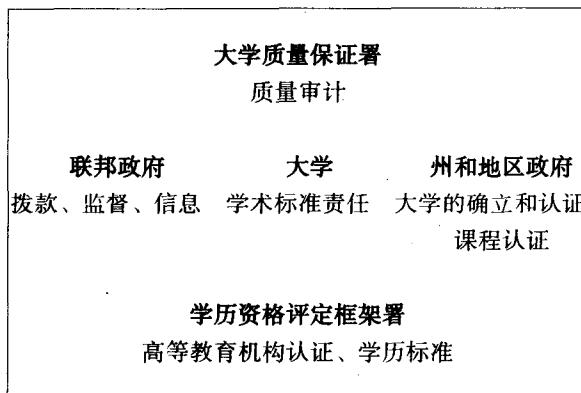


图1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框架

(一)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立的深刻背景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经历了大规模的合并重组，并在 90 年代开始快速增长，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一样，进入了大众化和普及化的发展阶段。目前，澳大利亚国民中有 40 万人在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还有近 10 万留学生。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政府必须向社会公众承诺高等教育质量有相当高的标准，并能通过自己的积极作用给予维护和提高。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即大学也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个人或家庭的理性投资行为，他们有理由享受到质量有保证的教育服务。

在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阶段，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其主要构成要素包括优质的生源、师资、学科、其他办学资源和毕业生就业市场等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质量的竞争是核心。澳大利亚的高水平大学即“老八所”在进入 21 世纪的前后几年都制定了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其目标都是要用 10 年~20 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学校办成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而按国际标准衡量的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与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例如悉尼大学 1999—2004 年战略规划中提出：悉尼大学在保持大学传统、提高创新能力和保证大学的教学科研质量方面起领导作用，要争取被世界认为是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水平的代表。

近十多年来，澳大利亚政府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拨款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大学减少了对政府的依赖，更多和更自觉地依赖于市场、社会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大学也转变观

念，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办学理念，例如：学生是学校的客户，学校必须让顾客满意；办学质量就是商家的产品质量；学校要参与教育市场竞争就应该在管理、财务等多方面增加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等。理念的更新和角色的转变使大学更加自觉地把质量放在办学的中心地位。

(二)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运作

1. 联邦政府

(1) 设立各种委员会和专门机构发挥其职能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通过教育、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级委员会（Ministerial Council on Education, Employment,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 简称 MCEETYA）在保证高等教育质量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负担重大责任。1992 年，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委员会成立了，该委员会对质量问题提供建议，执行制度性质量保证政策和程序的独立审计，并且向政府推荐拨付相关年度质量资金。1993—1995 年间在质量保证计划的资助下，进行了三轮独立全面的院校审计。1995 年成立了澳大利亚大学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Australia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简称 AQF），负责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格授予。1999 年，联邦、州和地区教育部召开教育、就业、培训和青年事务部长级会议，提出了高等教育鉴定标准常规途径问题和州、地区和联邦教育部的高等教育裁判委员会的程序。1999 年 10 月联邦政府通过了在联邦资助的大学中建立新的质量保证机制。2000 年 4 月，联邦政府建立了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署（Australia University Quality Agency, 简称 AUQA）。联邦政府在 2000 年 1 月设立了澳大利亚大学教学委员会（Australia Universities Teaching Committee, 简称 AUTC），其主要职能是鉴定澳大利亚大学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向政府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增进国内外大学教学方面的协作和信息交换，管理澳大利亚大学教学奖。这些委员会和机构使联邦政府在保障教学质量中起到积极作用。

(2) 制度性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

1998 年，联邦政府决定把质量提高与对高等教育的拨款结合起来，要求从本年度起每个大学度要提交质量保证与改进计划，并把它作为教育年鉴程序的一部分。这个计划包括大学在教学、科研、管理和社区服务等领域维护和促进质

量保证的目标和策略。这个制度性计划是联邦政府收集各大学绩效信息的重要工具。因为每所大学的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中都包含两项全国性调查成果数据，评估近几年来毕业生的职业成就以及毕业生对教学的体会。该计划使联邦政府能够向社会公众报告澳大利亚大学质量和质量保证程序，使这一工作具有了充分的透明度。

(3) 教学质量的学生满意度调查（全国性）

联邦政府通过一项全国性的学生满意度问卷调查，直接从高等教育的受益者——学生那里获得关于教学质量的信息。这项学生问卷调查由联邦政府资助，每年在各大学的学生中进行，学校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这个调查有两项内容：一是课程经验问卷（Course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简称 CEQ）。课程经验问卷涉及教学、目标及标准、工作量、评估、一般技能和综合满意度。二是研究生科研经验问卷（Post-graduate Research Questionnaire，简称 PREQ），它主要涉及研究生对监督、技能发展、学风、基础设施、论文审核和目标的满意度。联邦政府资助的还有毕业生职业调查（The Graduate Destination Survey，简称 GDS）和毕业生技能评估（Graduate Skills Assessment，简称 GSA）。这些问卷调查和评估所得来的数据，一般运用于三个方面：一是联邦政府用于监控各高等教育机构的质量并决定是否对其财政资助政策进行调整；二是各教育机构将其纳入自己的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的程序之中；三是数据的公布包含在商业化的学生指南之中，有助于指导学生选择。

2. 州和地方政府

在澳大利亚，州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的质量保证中担负相当多的责任，不过各州和地区的标准及运作程序不同。2000 年 4 月，联邦政府教育部长签署了《国家高等教育审批程序草案》，该草案的执行保证了全澳洲一致的标准和规格。具体来讲，州和地方政府在以下五个方面负有质量保证的责任：①大学的认证和大学名称的保护，即各大学在满足国家规定的标准的条件下，通过州和地区立法确认和认可，不在立法体制权限内，任何院校和组织不得使用“大学”名称。②对在自己管辖区内从事大学教育而本部在其他州或地区的学校，有责任关注它们的实施质量，在经与设立院校（分校）的州或地区的行政部长

磋商之后，对它们的课程和资源进行鉴定。③对非自我鉴定院校提供的高等教育课程进行鉴定，要求应符合 AQF 制定的基金级条件，达到澳大利亚同级课程的水平，要有充足的财政和其他保障课程实施成功的计划等。④海外高等教育机构认可。⑤海外留学生课程认证。

3. 澳大利亚大学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AQF）

澳大利亚大学学历资格评定框架署的主要职能是：对非义务教育的教育机构进行注册登记，为职业教育、培训和大学及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学历晋级提供标准，确保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完整性和各层次学历的连贯性。在澳大利亚，公立大学是自我认证和自我管理的，大学具有制定毕业标准的权力，但 AQF 为各大学学士学位标准的设立提供指导和监督。

4. 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署（AUQA）

澳大利亚大学质量保证署是由 MCEETYA 在 2000 年 3 月成立的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全国性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①每隔 5 年对自我鉴定学校和州、地区高等教育鉴定机构进行一次质量审计。②向社会公布有关审计结果。③通过对机构和州、地区政府鉴定程序的审计，对新大学认证和非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鉴定的标准进行评估。④根据审计程序获得的信息，公布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系统及其质量保证程序的有关标准和国际地位。

AUQA 的质量审计工作完全是程序化的，它制定了自己的工作章程、质量监督和审计的原则、具体的步骤和程序，并建立了相应的信息资料库，并有注册审计员 100 人。AUQA 的运作资金来自联邦、州和地区的教育部长（MCEETYA 的成员）并归他们所有，同时也从接受审计的机构那里收取审计费用。AUQA 的运作像一个公司，在董事会领导下独立于政府及高等教育行业运作，董事会成员由 12 人组成：高等教育事业州长办公室选出 5 人（包括大学在内的自我鉴定学校 4 人，非自我鉴定学校的高等教育课程供给者 1 人）；部长任命 6 人（联邦教育部 3 人，州和地区教育部 3 人）；AUQA 质检组组长 1 人。董事会第一主席由联邦部长任命，其他主席由董事会选举。

联邦和州政府运用法律手段为高等教育的质

量监督审计制定了相应规定，每个大学每五年要接受一次全面的质量审计，并以此作为衡量大学质量的重要指标。2000 年 AUQA 成立后，各个学校第一轮的审计从 2002 年延伸到 2006 年。

AUQA 对自我鉴定的大学的审计是全校性的，既涉及大学的战略规划、办学目标，也涉及到大学教学科研的水平、学生培养的质量等各个方面，以自我测试和访问为基础，具体的范围包括：①学校领导层，战略计划；②教与学，课程；③研究、咨询、社区服务；④国际化；⑤对利益相关者的理解；⑥员工和员工支持；⑦学生支持；⑧学术支持；⑨管理、设施、资源等。

AUQA 对一所大学的审计程序是：①拟接受审计的学校对自己在教学、科研、社区服务和管理方面主要领域的水平包括学校的海外活动做出自评估，并确定接受审计的时间。②向 AUQA 提出接受审计，AUQA 与学校充分协商，由 AUQA 主任委员会最终决定产生审计小组。③被审计学校按照一个标准格式提供出一份学校的业绩报告和相关的附件（支撑材料），并在审计小组进校考察前 3 个月提交给 AUQA。④审计专家小组用 10 天以上的时间访问学校，包括与 250~300 位教师、学生座谈，向相关的各方面人员（如社区、利益相关者等）的代表了解情况。⑤查看与学校业绩报告相关的文件。⑥访问大学的其他办学机构（如果有在海外办学，要到海外机构去访问）。⑦审计小组进校考察后 3 个月内完成审计报告。⑧公开发布审计结果（报告）。⑨要求被审计学校在被考察后的 7 个月内有回应行动，并在之后的 1 年到 1.5 年的时间内完成质量改进和发展报告。完成以上程序，时间是 2 年半到 3 年。按 AUQA 的表述，他们对大学的质量审计最终形成的是“结果—改善—接近（新目标）—发展—结果”的良性循环。

AUQA 对大学质量监督审计的指导方针、原则、程序和要求是以法律形式予以确认的，从而对各大学的质量监督审计起着统一的指导作用。但是，这种审计绝不过分介入大学而是维护大学的学术自治，并且注重高等教育领域的多样化，为各个学校的特色发展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对像悉尼大学这样的研究型大学的审计，就是根据学校自身的战略目标定位，在教与学、研究以及国际化方面更多地用国际标准来

比照。

AUQA 并不对它审计所得出的结果负责，它的职责只是对社会公众公布被审计学校的审计报告中的数据，也包括对学校教与学、研究、管理、社区服务、国际化等方面肯定之词和建议改进之处。这些审计结果可以运用于三个方面：一是大学作为自身质量改进和发展的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提出新一轮的战略计划；二是州或区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对所资助大学绩效管理的信息工具，如果被审计的大学得到的是消极报告而又没有做出适当反应（即没有质量改进的计划和行动），将会招致财政制裁或相关的管理行动；三是在社会公众层面上，满足接受高等教育者和利益相关者对大学教育质量的关注，接受社会的评判和监督。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财政拨款制度并没有与对大学的审计结果结合起来，这种质量审计最终并没有给学校一个整体办学或学科的质量等级，从而不影响学校从政府那里得到资助。目前，澳大利亚 38 所公立大学办学经费的 41% 可以从联邦政府得到，这些经费是根据各个学校上报的基础数据如学生人数、课程数、研究生人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等拨给的，质量审计的结果并没有改变这一点。但是，在我们的访问中，许多学校都十分重视 AUQA 的审计结果。他们认为，由于审计报告（结果）是公开发布的，如果学校得到的是消极的结论而又没有采取改进质量的行动，学校就会失去声誉，失去生源和收入。

我们感到，AUQA 在澳大利亚的质量保障体系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澳大利亚在他们的高等教育改革中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大学为什么要接受这样的质量审计？在我们的访问中，AUQA 的一位主要官员是说了这样三句话：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变化的时代，接受公平而又有质量保证的高等教育已成为社会公众利益，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必须要满足大众对教育质量的要求。大学在变化之中，如何适应变化，对大学的领导者提出了挑战，以高质量去迎接挑战是大学应该做好的事情，我们应该以全球化的标准去衡量我们的工作。对大学的质量审计以及我们所采取的这种运作方式（程序），就是要在政府、大学、高等教育受益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找到一种利益平衡。

5. 大学

澳大利亚的大学是在联邦、州或地区法律框架之下建立的，他们享有充分的学术自治的权利，同时对其自身的学术标准与巩固其质量保证程序负有主要责任。所有大学都要制定年度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内容包括学校发展目标、关键策略和预期成果。每所大学都制定了教学质量保障程序，开展课程评估、学生评价反馈等活动，并进行经常性的自我鉴定，以确保教学、管理、评价等方面的质量。许多大学都有内部的教育质量保证机构，而学院往往承担学生的教学评估、发展教学改进的特殊项目和为一流教学提供内部激励。教师提升的标准通常注重教学质量、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贡献。近年来，澳大利亚的许多大学都积极融入国际化的潮流之中，他们十分重视留学生教育的质量问题，并按照国际化的标准来检测课程教学、教师水平、学位授予（学生质量）、科研活动的质量，以提高他们在世界高等教育及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和地位。

悉尼大学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比较具有代表性。悉尼大学教与学学院（Institue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是专门负责教学质量管理、检测、评估的机构，由负责学术的副校长领导。该机构有学术人员 7 人，非学术人员 5 人，还有一些临时雇用的人员。他们的核心功能是在大学的教与学领域中提供服务，包括学术发展、教育教学研究、教与学的检测评估、教师培训。在教学方面，主要是通过学生问卷来评估教师讲授课程的质量和满意度，并完成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成绩的检测。在学生学习方面，主要进行学生学习质量的检测，包括第一年经历、毕业生特质和能力、考试等。他们提出的关于质量保证的原则是：以学院运作为基础，透明度（信息公开，得到反馈）贯彻于各学院的教学实践之中，以教育教学研究为基础（研究成果体现在问卷的设计中）。该机构的运作机制是依靠成立的若干个工作组（针对每一个工作领域），由各学院的中高级人员组成，这些工作组已经运作了 5 年，他们的工作就是经常在一起研究协商如何提高质量，如何把相应的措施贯彻到学院的工作之中去。该机构每年有两个主要工作：一是通过问卷收集教学质量的信息；二是检测学院的教与学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每年要写出一份关于教与学质

量的报告，这个报告在学校的网上公开发布。报告发布后，学校、学院、教师各个层面都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例如学校可以根据这个报告的相关情况，制定下一年度的质量保证和改进计划。学院可以根据这个报告向学校申请进一步提高质量的资金，因为这个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了他们在过去一年中教与学的成绩，同时也有各学院在研究方面的数据，如教师发表的论文，参加的学术会议等等。

卧龙岗大学（University of Wollongong）的内部质量控制与管理模式可以表述为“计划—行动—总结—改进”。他们的质量保证与改进计划分为三个层次：学校的战略计划，每三年制定一次；学校的主要功能发展计划，每两年制定一次；各学院、单位和员工的计划，每一年制定一次。学校设立了三个委员会，负责对这些计划的执行情况及其效果进行检测，并向学校提出质量改进和新目标的建议。卧龙岗大学对教与学过程的质量控制有一整套程序，在课程设置、学位、教师等方面都执行严格的质量标准。我们访问时 AUQA 刚刚完成了对他们的质量审计，预计最终的结果是相当好的。根据《澳大利亚好大学指南》，卧龙岗大学 2005 年在五个方面获得了“5 个星”，包括研究深度、毕业率、员工资历、毕业生找工作的难易、毕业后的成果、毕业生就业起点工资。

纽卡素大学在 2002 年 9 月接受了 AUQA 的审计。他们学校建立了内部质量评估管理机构（类似与悉尼大学的教与学学院），学校的质量管理模式采用的是“计划—行动—结果—改进”的内部循环，接近于 AUQA 的模式，其基础仍然是学校、学院及各部门、教职工三个层面的质量改进与发展计划。校学术委员会制定各学院、系、所的工作业绩表现的标准，每三年对他们的工作质量进行一次全面检查（2003 年 6~9 月进行了一次），这些工作质量报告要提交给学校的学术质量委员会和校董事会并作为下一次接受 AUQA 审计的自评基础。

6. 社会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实际上形成大学内部质量保证和外部质量保证两大部分力量。在外部质量保证中，除了政府及其政府设立的独立机构外，社会上的一些行业团体，如会计

业、建筑业、牙医业和药剂业等，在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方面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些行业一般都有职业资格的认证机构，它们参与大学的课程（即专业）设置，检测课程的结构及内容、学术标准和课时安排等，以保证大学这些课程的教与学的结果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并能引导行业的发展，而大学也愿意与一些能提供外部评价的社会组织合作，许多大学如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加入了国际和国内的高等教育网络组织，进行合作研究和国际水准的质量检测和同行评估。

（三）澳大利亚经验的启示

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主要存在着三种力量，即政府、大学和社会，这三种力量的不同配置形成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运作模式。从我们的学习考察看，他们的经验是可借鉴、有启发意义的。进入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面临着世界高等教育的质量竞争，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其学科水平和办学质量要以国际化的标准来衡量。这就要求我们从战略的高度来规划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问题，建立一个以学校自我维护为基础、国际一流为标准、政府和社会组织为外力的大学质量保障和评估体系，加大高等教育的全面质量管理力度。

（1）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独立于政府主管部门和高等教育机构对大学进行质量审计评估的机构。目前各学校接受的评估实际上很多，如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本科专业评估、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评估、重点实验室和研究基地评估以及其他一些专项评估等，这些评估都可检测学校的办学质量，但它们都是由教育部各主管司局负责进行的，其程序、标准不统一且分散，重复较多，学校也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成立类似AUQA这样的机构，对各大学的教学、科研、管理、社会服务、国际化等方面进行综合质量评估，并由国家立法保证其独立性、权威性和运作程序，这样也可以提高效率，降低运作成本。

（2）在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保障中，要充分发挥学校的作用，使各大学对其办学质量的改进、维护和发展以及自我评估成为整个质量保障体系的基础。在澳大利亚，他们的高等教育体制

深受英国教育体制的影响，大学自治的传统悠久，而且也得到政府的尊重和社会的认可。在大学自治的内外环境之下，学校把质量保证看成是自身的学术责任，而外部评估也并不介入和干扰学校的事务，把学校的定位、课程（即专业）设置、教与学、研究、社会服务、管理、国际化等看成是“大学体系本身的内在逻辑”。在我们对各个学校的质量评估中应充分汲取这一点，特别要处理好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关系，要注重质量保证的标准性与各个大学的特色相融合，对不同层次的学校分类指导。

（3）应加强对各国特别是高等教育发达国家质量保证体系模式及其实践效果的比较研究。应结合我国国情，系统研究质量评估的标准和运作程序以适应世界及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变化的需求，如研究如何处理好统一性、层次性、多样性以及国际化的问题，把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以科学地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

（4）应解决好大学质量评估结果的应用问题。质量评估以及最终形成的结果，对于政府来讲，是对高等教育进行绩效管理的一种手段，除了公开接受公众的评判和监督外，还应与对大学的财政拨款和教学科研的专项建设经费联系起来，这样它也可成为政府可运用的一种激励手段。对于接受评估的大学来讲，评估结果也应该像AUQA要求澳大利亚大学的那样，成为质量维持和改进的参照物，在内部形成质量保证的长效机制和良性循环。

（5）在政府、大学和社会三个层面上，我国目前社会力量参与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作用还相当不够。不仅社会力量（主要是工商业界）对学校的捐赠资助机制没有形成，在大学的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质量的标准及维护上，社会组织（行业组织）更少有参与，而他们才是大学“产品”的直接用户。澳大利亚的一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如成立有三方参与的相关的委员会，由它们来发挥一些职能。

（写于2005年6月4日～7月3日，澳洲，
修改于7月4日，北京，外国专家大厦）

优化中国高等财经教育课程体系探析

毛洪涛 尹音频

中国高等财经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目标是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适应21世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具有创造、创新、创业精神与能力的高等经济管理人才。科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科学的课程体系基础之上的，本文力图通过分析高等财经教育课程体系的国际变化趋势，提出优化中国高等财经教育学科课程体系的设想。

一、高等财经教育本科课程体系的国际变化趋势

为了适应21世纪的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需要，发达国家在调整学科专业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以培养出更具适应性与竞争力的经济管理人才。

我们以美国的高等财经教育为主要分析对象。美国的高等财经教育本科课程体系是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方向课三层所构成，它具有以下特征与变化趋势：

1. 课程体系特征

(1) 宽广的基础课程，强化通识教育。美国大学注重学生基础知识的广度，他们认为，大学应在九个方面开设本科最低限度的必修课：①探索、抽象的逻辑思维和批判性分析；②基础文化，写、读、说、听；③理解数据；④历史意识；⑤科学；⑥价值；⑦艺术；⑧国际和多元化

文化经验；⑨需深入学习的学科。^①在大学本科（包括经济与工商管理专业）开设的覆盖面广的，涉及工具类、人文艺术类、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类、自然科学类等多学科的课程，保证了受教育者能接受良好的通识教育。

表1 美国高等财经教育本科基础课结构^②

工具类	沟通课程	写作、演说、逻辑
	数学与计量分析课程	微积分、决策定量方法、计算机导论、统计等
人文与艺术类	人文课程	西方文学、美国历史、宗教、哲学等
	艺术课程	音乐、戏剧概论、电影概论、绘画等
社会科学与行为科学类	社会科学课程	美国政治与政府、社会学、法律基础等
	行为科学课程	人类学、心理学、激励与人的行为等
自然科学类		科技进化史、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环境学、天文学、应用地理学等

(2) 严厚的专业基础课，夯实专业基础与能力。美国各院校都强调财经专业基础知识与专业

^① 王英杰. 挑战与应答：当前世界高等教育改革述评. 见：面向21世纪加强高等教育学改革与研究.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② 国内贸易部课题组. 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161~169

基本训练，在专业基础课程的设置中突出体现了两个原则：一是“厚”——深入掌握本学科核心知识。美国学者波特认为：大多数商学院的课程不论是本科生还是硕士生层次的，都受到AACSB相应标准的强烈影响。该标准的核心是所谓的“知识的共同主体”要求，它规定在以下五方面“至少要有一年的课程”：①商品与服务的生产和营销以及商业企业的理财；②经济和法律环境以及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对组织的影响；③会计学、数量方法和管理信息系统；④组织理论，行为科学和人际交往；⑤分析与综合管理层的决策。由于受AACSB（美国商学院联合会）的影响，美国大学的商科专业课几乎是统一的，主要有经济学、会计学、财务管理、统计学、营销学、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生产管理、商业政策等核心课程（见表2）。二是“严”——必须掌握本学科核心知识。美国大学商科专业的基础课几乎没有选修课。例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管理学院规定的42个学分专业基础课全部都是必修课。通过坚实的专业基础课教育，受教育者奠定扎实的基础，才能有继续发展的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

表2 美国高等商科专业基础课结构^①

堪萨斯州立大学 (40学分)	林肯大学 (42学分)	南佛罗里达大学 (42学分)
营销学 3	营销学 3	营销学 3
经济学 6	经济学 6	经济学 6
企业、政府与社会 3	行政政策 3	商业政策 3
商务与经济统计 6	统计学 3	商务与经济统计 6
理财要素 3	理财学 3	财务管理原理 3
经济活动会计 3	会计学原理 6	财务与管理会计 6
管理信息系统 4	商务与职业沟通 3	计算机在企业中应用 3
企业战略 3	经济法 3	经济法 3
管理概念 3	人力资源管理 3	管理学原理 3
生产与作业管理 3	生产管理 3	管理科学导论 3
投资金融会计 3	三四年级选修课 6	中级价格理论 3

(3) 精与活的专业方向课，拓展学生发展空间。美国各院校在专业方向课程的设置中突出体现了两个原则：一是“精”的原则，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专业课中必修课的门数很少（一般只有营销管理、国际营销等两至三门课），另一方面，专业课总学分数较少，如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管理学院的专业课总共才15个学分。二是“灵活”原则。美国大学商学院专业课中必修课

少，而选修课多。很多大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只确定了一个大方向，在大学就读三年后，可以在最后一年根据社会需求灵活地选定某专业的专门化方向，并确定专业的选修课程。^②这有利于学生根据社会需求，充分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来定向，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拓展空间。

2. 知识结构与课程结构呈融合化的趋势

随着信息革命的推进，经济与管理学科日趋现代化，理、工、文、经、管、法等学科之间的渗透化与综合化不断加深，这种现象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1) 经济学与数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数学分析方法在经济与管理中得到广泛与深入的应用。在理论研究方面，数学与模型是进行经济学研究必需的工具。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贡献均是在不同程度上应用了数学，建立了经济数学模型。正是有了随机数学理论，才有了如今的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经济决策与预测、证券组合理论、保险精算理论等。在应用方面，经济学家需要建立宏观经济模型或某一经济行为特定的数学模型，来分析经济运行状态；统计分析人员需要建立国家经济景气的预警模型；企业管理人员需掌握投入产出模型、市场预测模型、市场消费模型、经济控制模型等。同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变化，新的经济问题不断出现，向数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为数学的应用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进一步推动了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学的发展。因此，高等财经院校必须重视培养与提高学生数学计量分析能力。

(2) 经济管理与信息工程学的渗透日益加强。当代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和网络技术的结合，为当代经济信息化奠定了技术基础。伴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电子商务等新型商品流通模式出现，经济管理与信息工程学相互融合，以信息工程学为依托的经济管理异军突起。面对信息经济的浪潮，国外的一些商学院及时调整了学科及课程方向，如美国马里兰大学、KOGOD商学院

^① 国内贸易部课题组. 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172

^② 国内贸易部课题组. 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177, 178